

武汉出版社

冯友兰三新理学研究

● 田文军 著



冯友兰新理学研究

田文军 著

武汉出版社

冯友兰新理学研究

田文军 著

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江岸区黄浦路248号 邮政编码430010）

湖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北省丹江口市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875印张 2插页 字数270千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定价：4.80元

ISBN 7-5430-0374-0/8.11

序

“五四”新文化运动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面临和承担着两大突出的任务：胜利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实现中国化；源远流长的传统哲学如何经过重新熔铸而得以现代化。冯友兰先生生当这一文化上的氤氲巨变时期，他以“贞下起元”的历史自觉，长期从事于传统哲学的现代诠释任务而取得了斐然可观的划时代成就。冯友兰先生一生经历了中国社会的革命代谢的曲折进程，而他一生执着追求的始终是“旧邦新命”。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经常想起儒家经典《诗经》中的两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冯先生这一“旧邦新命”的理想，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他的自我超越，不断维新的。正是这种“维新”要求，使他一生著作不倦，与时偕行，为道屡迁，而规模日益弘远。他在不同时期的哲学著作，早已流誉国中，蜚声海外，被人们赞为二十世纪中国会通中西，融贯新旧，确能体用皆备、自成条贯的哲学体系。冯先生以自己“抠出心肝”的学术创造，跻身世界哲学之林，成为国际著名的中国现代哲学家和哲学史家。

冯友兰哲学体系诞生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不是偶然的。从万历到“五四”，中国文化的近代化历程，就思维模式的衍变而言，似乎已经历了前“五四”时期“西学中源”之类的浮

浅地认同和“五四”时期“中西殊途”等笼统地辨异，而到后“五四”时期，特别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开始以后，在深重的民族苦难中伟大的民族觉醒，促使人们更严肃地反省民族文化发展的过去和未来，更深沉地思考中国往何处去的时代主题。只有置身于这样的历史时空，人们才深切地感到对于中西文化不能停留于浮浅地认同和笼统地辨异，而必须于同察异，于异观同，以求其会通；不能再陷于中西殊途，古今对立，体用割裂的思维模式中，而必须从哲学方法论上求得超越，把人类文化发展的共性和各民族历史道路的个性二者结合起来考察，深入辨识中西文化发展轨迹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只有这样才可能对三百年来中西文化的复杂论争作出新的总结，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前景作出新的探索。因而，兼体用，辨同异，别共殊，成为真正哲学思考的时代课题。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依靠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联结这一辩证认识的精髓，求得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理解而光辉实现的。当时，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也不同程度地着力于辨同异，别共殊的哲学课题的思考。其中，着力甚勤，致思很深，最具有时代敏感和历史自觉的要算冯友兰先生。冯先生以其博通今古，学贯中西的学术造诣，尤以其确具有“钩深致远”，“经虚涉旷”的哲学思辨慧力，因而无论他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总结，对于“新理学”体系的精心营建，或是对于人生觉解、精神境界诸层次的逻辑分析，对于哲学方法、认知途径诸流派的系统评判，都在衡论中西，察异观同，弘扬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永久价值，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前景诸方面，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即哲学史以论哲学”，由“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是中国先哲的治学传统。冯友兰先生从三十年代以来就着力于哲学史的研究，其通观“子学”与“经学”的《中国哲学史》两卷巨构，继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之后，考辨源流，别开生面，成为第一部突破儒学道统，摆脱学案架构的系统清理中国哲

学历史发展的论著。稍后，别名《中国哲学之精神》的《新原道》和用英文撰成的《中国哲学简史》，更是言简意深，展示了冯先生独特的中国哲学史观。直至近年，以马克思主义为圭臬所撰著的多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扬榷诸家，独抒己见，乃冯先生深自縻括的晚年定论，尤为海内外学林所重视。冯先生对哲学史研究的丰美成果，其即哲学史以论哲学的真知灼见，对后世启迪实多；经布德(Derk Bodde)先生与休斯(E. R. Hughes)先生之译介，已成为世界共享的精神财富。

冯先生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另一独特贡献，是他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所献出的以“贞元六书”为代表的“新理学体系”。这一哲学体系，以其独特的理论形态，反映了抗日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理论觉醒，标志着中国近代哲学形态经历了长期“难产”而终于达到理论上的成熟。“新理学”体系不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且逻辑结构谨严，论证方法周密，它紧紧抓住共相和殊相的关系这一时代课题，认定这一课题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活水源头”乃是程朱理学，因而自称“新理学是‘接着’宋明道学中底理学讲底，但它是一个全新底形上学”。同时，它又最能体现“中国哲学的精神”，把“极高明”和“道中庸”、“明体”与“达用”二者统一起来。故“新理学”体系，囊括了宇宙本体、人生价值、社会文化、政治伦理诸层面，涉及到哲学的本体论、知识论、方法论、价值论、人生观、历史观、文化观、宗教观、艺术观等诸领域，自为经纬，成一家言。“新理学”体系，诞生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氛围中，中西古今文化正在汇聚中冲突，矛盾中融合，其理论旨趣在于追求对这种异质文化的汇聚——冲突，矛盾——融合的理解和掌握中国文化发展的去向。它的诞生，曾在中国思想界引起强烈反响。四十年代以来，赞同者，辩难者，批评者代不乏人；冯先生自己对其“新理学”体系的理论意义、历史地位和社会作用，在不同时期也作过自我评估，当前冯友兰“新理学”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

对现代中国哲学思潮研究的一个重点。

冯友兰哲学思想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由于它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智山慧海”中涵泳而出，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其中跳动着一颗笃爱中华文化的心。正因为具有强烈的民族性，所以能对世界哲学论坛发生一定的影响，作出一定贡献。正因为其中有颗炽热的爱国心，如其自咏：“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所以能够激励后继者为中华文化的“真火”相传而甘愿充作“后薪”，继续燃烧下去，永远不会熄灭。

田文军同志因续《三松堂自序》而有志于研究冯友兰哲学思想，为撰写《冯友兰学行编年》和《新理学评估概览》而屡趋未名湖畔三松堂，亲聆冯先生的教诲，光风霁月，感受实深。因而遍访熟悉冯先生及其思想的老一辈学者，全面掌握冯先生思想产生的时代场景及其与时偕行的致思脉络，首先写成学位论文《新理学的思维方法及其时代特质》；继之以锲而不舍的努力，分题深入，研究了冯友兰思想的衍生历程、理论结构、分析方法、时代意义以及冯先生自我评估等诸侧面，发表了专题论文多篇，琢玉三秋，终于撰成《冯友兰新理学研究》这部国内深入研究冯友兰哲学思想的系统著作。我们初读书稿，乐观其成，感到本书的优点在于：不是孤立地研究冯友兰哲学，而是力图将其置于“五四”以来中西文化冲突融会的广阔历史场景中去加以诠释，并从时代思潮中三大派别——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直觉主义的相互激荡中来考察，如实论定冯氏哲学的思想方法的基本特征是理性主义，不是片断撷取冯氏哲学的某一侧面，而是着眼于整体结构，公允评判冯氏哲学产生和演变的历史进程以及它在中国文化近代化历程中的客观历史作用；不仅深入剖析了感性与理性、科学和哲学、殊相和共相等关键问题上冯氏的理论贡献和失误之处，尤其著力抓住“新理学”的思维方法这一核心，从而透视“新理学”如何在理智上趋新而在情感上恋旧的矛盾性格。由于此书以冯友兰哲学思想为对象，历史地溯其源流，逻辑地论其体系，结构谨

严，文字晓畅，评断公允，缜密较深，对于冯友兰哲学的系统研究，无疑是一个贡献；对于清理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评定中国近代哲学诸形态的历史地位，特别是在当前中西文化汇聚冲突的新形势下，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中国现代化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民族文化主体问题，无疑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萧蓬父 唐明邦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引 言

八十年代以来，一股文化研究的热潮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蓬勃兴起。人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思考起“五四”时期人们关注过的历史课题，审察中西文化异同，思考对外来文化的选择消化；探寻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接合点，设计重构中华文化的宏伟蓝图。就人们在思考中已经凝聚成的认识成果来看，在某些专论方面已远胜“五四”时期的学者，就其理论的系统性而言，又似乎还未能达到“五四”以来梁漱溟、冯友兰、朱谦之一类学者所取得过的成就。尤其是还没有出现冯友兰那样建构在自己的形上学基础上的文化理论系统。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史上，冯友兰不仅曾因继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之后，写成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而名闻遐迩；而且由于在其“贞元之际所著书”中“上接程（颐）朱（熹）理学，并与西方新实在论相贯通，构筑了富于思辨性的独特思想体系”——新理学而蜚声海内外，^①五十年代以来，冯友兰在反省自己过去学术活动的同时，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理解中国哲学的发展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其间虽历经坎坷，但他矢志不渝，著述不辍，始终不放弃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反思，在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以五百万字的浩繁著述确立了自己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哲学家哲学史家的双重身份和

^①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冯友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中文）版。

地位。

冯友兰的新理学是由《新理学》《新原人》《新事论》《新世训》《新原道》《新知言》等“贞元六书”所构成的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以其独特的理论形态向人们“提贡了一种宇宙的类型，提贡了一种人生的类型，提贡了一种历史的类型，更提贡了一种认识的类型”。^①它不仅使长期处于难产之中的中国近代哲学开始摆脱简单比附、素朴芜杂的理论形态而具备近代哲学的科学性格和理性精神，而且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道路作出了哲学的理论阐释。当然新理学的形上学与文化理论并不是完全科学的，其中有对事物本性和文化发展的理解和自觉，也有对传统文化的偏执和对事物本性的误解。这种矛盾性格使新理学既没有被人们作为指导中国文化建设实践的理论武器，也没有被人们束之高阁，置之不理，而是“引起国内思想界许多批评、讨论、辩难、思考”。^②五十年代以来，新理学更是受到了人们尖锐地批判。但是在人们习惯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中思考问题的年代里，人们对新理学的批判不可能是辩证的否定，也不可能升华到扬弃的认识层次。

科学的哲学史观告诉我们，人类理性思维的历史是一个统一的发展链条。历史上每一种理论体系作为链条的一个环节，都有其诞生的必然性与无法替代的存在权力，都具备自身独有的认识价值。以这样的观念为前提来考察冯友兰的新理学，我们可以看到其形成决不是偶然的。反思中国文化的近代历程，可以说中国文化脱离中世纪而走向近代，是在剧烈的中西文化冲突中起步的。当鸦片战争的炮火掀开中国近代历史的帷幕，深重的民族灾难即迫使人们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一个严肃的历史课题。

① 孙道升：《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国闻周报》1935年12卷45期。

② 贺麟：《当代中国哲学》第32页，见《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参考资料》第四集，商务印书馆1959年出版。

从文化的层面来看，这一课题的实质即是：当西方民族在数百年间建立起强大的近代文明之后，中华民族要不要吸收西方近代文化的精醇养料，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文化，建构新的民族文化，跻身于世界近代文明的行列。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激烈的古今中西之争。

哲学是高层面的文化现象。在根源于中西文化冲突而展开的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论争中，人们急切地需要哲学提供方法论的指导。这种要求是中国哲学走向近代的历史契机；中国哲学的发展又构成了中国文化走向近代的重要内容。但由于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封建哲学传统的缠扰和西方文化的渗透碰撞，中国近代哲学的发展进程中，荆棘丛生，步履艰难。从一八四〇年开始，到“五四”运动之前，虽经人们艰苦求索，使中国哲学中出现了某些近代特质，但人们对西方文化了解极为有限，理论思维始终未能完全挣脱中世纪传统的桎梏。“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加速了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人们视野更加开阔，对于运用新的思维方式，解答时代规定的哲学课题更趋自觉。加之三十年代后期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亡国灭种的危机使炎黄子孙走向了统一的抗日战场。现实生活更迫切地需要人们系统反思民族的精神生活，确立起民族的主体思想，指导人们拯救民族危亡的伟大斗争。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终于出现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冯友兰的《新理学》，金岳霖的《论道》等著作，各以不同的理论形式和思维方法阐释了事物的共相与殊相的关系，回答了时代要求哲学回答的主要课题。冯友兰正是在建立自己的形上学之后，“原人”论事，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道路。可见新理学的诞生有着深刻的历史缘由。因此，我们只有将新理学纳入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背景下解剖、辨析，才会发现这一理论体系赖以生发的时代土壤，及其内在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确立对其扬弃的科学根据。

同时，历史和现实都可能成为繁荣文化的源头活水。当我们

把视角对准现实的文化生活时，并没有代替对历史的反思。通过反思，发现历史上那些为现象所掩盖或因局限遭忽视的文化成果，总结其理论的经验教训，确立新的文化发展起点，也可以培植和滋润现实的哲学文化园地。因此我们对冯友兰在新理学中建构的形上学和基于其形上学而建立的文化理论作一些客观地而非臆断地剖析、评估，也许会为我们今天思考中国文化的过去和未来，谋求中国传统文化在新起点上的复兴提供某些借鉴。

目 录

引 言	(1)
-----	-------

第一章 冯友兰的个性结构

——新理学产生的主观机制	(1)
正统的学人生活道路	(1)
学贯中西的哲人素质	(5)
“五四”时代的民族意识	(18)
思想感情的绅权烙印	(28)
漫长的清华教授生涯	(36)

第二章 剧烈的中西文化冲突

——新理学形成的时代场景	(41)
中国向何处去	
——民族面临的历史抉择	(41)
古今中西论争	
——文化建设的多种模式	(43)
别共殊	
——文化哲学的时代主题	(52)

第三章 贯通中西 融会新旧

——新理学演生的历史行程	(60)
比较中西文化	
——新理学的西学准备	(61)

清理中国哲学传统

- 确立新理学思想的历史接合点……………(78)
 从《新对话》到《新理学》
- 新理学的刍形和成形……………(96)

第四章 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 新理学的系统和结构……………(100)
 - “冲漠无朕 万象森然”
- 以理范畴为核心的共相说……………(101)
 - 物与理……………(101)
 - 真际与实际……………(115)
 - “无极而太极”
- 围绕气范畴展开的大化流行论……………(126)
 - 气与道……………(126)
 - 日新与循环……………(137)
 - “中国到自由之路”
- 文化类型转换说……………(146)
 - 文化与文化类型……………(147)
 - 文化类型与社会类型……………(154)
 - 文化类型的转换……………(158)
 - “极高明而道中庸”
- 以心性范畴建构的人生境界论……………(165)
 - 觉解是人的本质……………(165)
 - 道德的普遍与特殊……………(171)
 - 人生价值与人生境界……………(177)

第五章 “辨名析理”

- 新理学的思维方式……………(184)
 - 新理学方法立论的双重根据……………(184)

(一) 哲学与人生·····	(185)
(二) 方法与哲学·····	(190)
新理学方法的二元结构·····	(200)
(一) 正的方法——逻辑分析·····	(200)
感与思·····	(200)
分析与总括·····	(204)
形式底释义·····	(207)
(二) 负的方法——直觉体认·····	(212)
“烘云托月”·····	(212)
“于静默中立义竟”·····	(214)
实用中的新理学方法·····	(217)
(一) 从命题推导哲学范畴·····	(218)
(二) 以逻辑证明共相先于殊相·····	(222)
(三) 在意念中泯灭物我界限·····	(225)
新理学方法的思维特色·····	(228)
(一) 融会的致思趋向·····	(229)
(二) 理性主义的实质·····	(233)
新理学方法的启示·····	(239)

第六章 人间自有真情在

——冯友兰对新理学的反省和认同·····	(244)
“圣人复起 必从吾言”·····	(244)
“不堪往事重回顾 四十年间作逆流”·····	(254)
“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	(264)

第七章 新理学评估概览····· (271)

第八章 冯友兰学行编年····· (289)

第 一 章

冯友兰的个性结构

——新理学产生的主观机制

理性思维是一种高强度的能动的个人活动，任何一种哲学理论的形成都是哲学家这种思维活动的结果。哲学家们的个性结构决定着他们从事哲学活动的思维方式与思维类型，决定着他们对哲学课题的选择和哲学理论本身的价值功能的理解，构成其哲学理论体系产生的主观机制。冯友兰的新理学作为一个形成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哲学体系，就这一哲学体系所坚持的超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最哲学底哲学”立场，以及基于这种立场所展示的对主观与客观关系的理解，对世界整体图景的描绘，对人生方法和人生价值的论释，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较、评估，以及对中国文化发展方向道路的选择，都既典型地表现出冯友兰学贯中西的知识结构和哲学的思辨能力，又曲折地反映了冯友兰及其所隶属的社会势力在经济利益、政治要求、道德理想诸方面的个性特征。因此我们考察冯友兰哲学即新理学，首先就应当考察新理学得以形成的主观机制，即作为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冯友兰的个性结构。

正统的学人生活道路

冯友兰，字芝生，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四日出生在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的一个封建家庭里。

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字树侯，是清光绪戊戌科进士，曾任武昌方言学堂会计庶务员，后得缺署理湖北省崇阳县政。母亲吴清芝，通文墨，是一位精明干练的家庭主妇。冯友兰祖籍本为山西省高平县，其祖辈经商才来到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落户。到冯友兰的祖父冯玉文管理家业时，冯家在当地已经占有一千五百多亩土地。这在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北方农村要算是一个十分富有的家庭了。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农村的文化教育总是与每个家庭具体的经济状况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状况被长期延续着。冯家由于良好的经济条件，其子弟们都受到了较好的传统文化的教育。冯玉文的子弟中，除二子台异进士及第外，长子云异，三子汉异都是秀才。冯友兰生活在这个书香人家中，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

冯友兰的学习生活主要是由他母亲直接安排的。一九四四年冯友兰的母亲病故以后，冯友兰曾为其母写过一篇《祭文》，其中说他母亲：“值时代之不偶，屈长才於家庭，譬鲲鹏之巨翼，乃水击于池中，谢经国之远略，而造福於诸冯。……父得助而高翥，乃游宦于武昌，受高贤之知遇，始为宰于崇阳，虽牛刀之小试，亦驹隙之不长，忽遭疾而奄化，坠鹏程于初翔。无一言之遗命，留群雏于孟光。扶一柩而北驾，备廉吏之凄凉。既相夫之已毕，惟事亲与抚孤，凛劲节于冬雪，存冰心于玉壶。终慈日之余辉，游儿曹于上都，虽节衣而缩食，惟馈给之无虚，不相累于庶务，令专志于远图。”^①文中充满了对母亲的感激与爱戴。冯友兰及其弟妹的成长的的确与他母亲吴清芝有着重要的关系。冯台异四十二岁时暴病卒于崇阳任所，其时冯友兰实年才十三岁，冯友兰的弟弟冯景兰十岁，妹妹冯沅君八岁。从此以后冯友兰兄妹的教育与学业全由母亲操持。吴清芝恪守夫训，极其重视孩子们的人文基础的训练，念念不忘继承冯家书香门第的宗绪。她比附科

①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11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4年版。